

第三辑 **人文新视野**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文本诠释学及其他 艺术与真理 中国哲学中“体”的玄学意义 文本、
文化和无意识 英美美学与当代批评 梅洛-庞蒂与东亚美学 巴赫金
整体诗学研究和当代文艺学建设 巴赫金思想与现代小说创作特征
分析法 艺术要前进：二元背反矛盾的出路 中国戏曲的世纪命题
一个令人生疑的学案 符号学矩阵理据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合办 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西安外国语学院

主编 周发祥 杜瑞清
户思社 史忠义

理解与阐释

人文新视野 · 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合办 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西安外国语学院
主编 周发祥 杜瑞清
户思社 史忠义

理解与阐释

人文新视野 · 第三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理解与阐释 / 周发祥等主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人文新视野. 第3辑)

ISBN 7-5306-4243-X

I. 理… II. 周… III. 文学理论—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406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76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定价: 23.00 元

编委会成员

主 编 周发祥 杜瑞清 户思社 史忠义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户思社 史忠义 叶舒宪 许金龙

李永平 吴晓都 杜瑞清 孟长勇

周发祥 周启超 郭宏安 高广文

高建平 聂 军 党金学 钱 竞

梁 展 董小英 董炳月 蒋梓华

程 巍

编 务 程玉梅

目 录

理解与阐释

文本诠释学及其他:以《道德经》和《庄子》为例

(美)吴光明 著

黑玉琴 译 3

艺术与真理

——海德格尔对艺术的后形而上学阐释

(瑞士)英格博格·舒斯勒 著

钱 翰 译 35

中国哲学中“体”的玄学意义:“本体”和“体用”

(美)成中英 著

甄建明 译 63

文本、文化和无意识:无经典的生活

(澳)帕特里克·菲利 尼克·曼斯菲尔德 著

姜登祯 译 83

英美美学与当代批评:意图与置疑性解释学

(美)诺埃尔·卡罗尔 著

李媛媛 译 105

梅洛-庞蒂与东亚美学:“无形之形”与“视而不见”

(美)大卫·布鲁巴克尔 著

杜振东 译 124

诗 学

巴赫金整体诗学研究和当代文艺学建设

程正民 143

巴赫金思想与现代小说创作特征分析法

——从国外巴赫金批评史说起

凌建侯 159

艺术要前进:二元背反矛盾的出路

史忠义 208

中国戏曲的世纪命题

——张庚“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理论阐释

何玉人 232

一个令人生疑的学案

——形象思维问题

钱 竞 262

我们的诗歌的失望(外一篇)

(法)萨拉·斯泰梯耶 著

黄传根 译 272

符号学与语言学

符号学矩阵理据考

吴泓缈 289

一种视点：自然语言的语言学及与文本的对话

(法)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 著

许苏嘉 译 史忠义 校 319

创 作 谈

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

(日)大江健三郎 著

王中忱 译 339

文学评论

短篇小说及其他

(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朱景冬 译 367

理解与阐释

人文新视野·理解与阐释

文本诠释学及其他:以《道德经》和《庄子》为例*

(美)吴光明 著

黑玉琴 译

内容提要:本文以中国的《庄子》和《道德经》为例,探讨诠释学方法和发展方向。文章首先对诠释学进行解释和说明,描述了中国和西方的诠释学方法及两者的差异,中国的诠释学体现出主观的、情境的和历史的倾向,而西方的诠释学则具有客观的、普遍的和永恒的倾向。文章又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社会及哲学思想背景方面,分析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而说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诠释传统相结合的必要性。文章最后指出,要在内容不连贯的文本中寻求文本意义的统一性,应通过中西结合、中西互补、这一诠释学任务才能很好地完

* 原载涂经治编《经典与解读:中国文化中的诠释传统》(*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0)一书。作者:吴光明,耶鲁大学博士,威斯康星奥什科什大学名誉教授。

成。

关键词：文本诠释学 中西方诠释学 差异 结合
《道德经》 《庄子》

本文有两个中心：一、将中国和西方的诠释学结合起来；二、在内容不一致的文本中辨识文本的信息一致性。文章包含四个部分：一、诠释学是什么；二、西方诠释学；三、中国诠释学如何不同；四、两者何以应该结合，以及两者结合后，诠释学任务实际怎样完成，应该怎样完成。

第一部分有关“什么是诠释学”。它是理解“文本理解方案”的一种尝试，即解读方法论，理解导向之研究。因为“导向”由其解读问题所决定，所以诠释学就研究那些问题。所有科学皆为理解而考察，因此诠释学即为所有科学的基础科学。它是一种跨文化方案，“文化”是导向性的解读假设。

第二部分涉及“西方的诠释学”。它自《圣经》解读发展而来，通常就如下三个问题提问：“文本说什么？”“文本所言是否确实？”“如此提问有何意谓？”所有这些问题展示了西方诠释学的方向——客观、普遍和永恒。近来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性相对论中，这一倾向已有所发展。

第三部分论述“中国的诠释学”。它着手于关于古典作品的人生感悟，由如下三个问题所支配：“这一古代文本如何支持当前政治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本思想如何对抗其他传统？”“这种文本思想背景如何培育我的人生？”这些政治的、辩护的和虔诚的倾向，展示了总体性的诠释方向——主观、情境和历史。

最后一部分是“实践中理想的诠释学”。我们必须把这

两种诠释学传统结合起来。刘殿爵和亚瑟·韦利 (Arthur Waley) 论《道德经》，葛瑞汉 (A. C. Graham) 论《庄子》，皆是优秀的文本诠释学的典范。他们尽管声称这两本书是“什锦菜”般的大杂烩，但还是阐明了其中有特色的主旨，在龃龉之处指出了每本书的统一性。另外，由于中国古“书”不只是由“作者所写”，而且是“历史发展”成为智慧结晶，因此“讹误”文本（被阑入、删节和修改的文本）在绘制其演变史中有其用途。所以，文本诠释学首先要勾画义本的历史演变，其次要辨识其历史统一性。这一使命需要中国和西方的敏感力和思维方式；诠释学是一种文化共生体。

什么是诠释学

尝试理解通常叫做“解读”；而试图解读古代文本则惯常称做“诠释学”。这不正是破解那些潦草写在纸莎草、石板、竹简和丝帛上难以理解的符号的平实艺术，而是对古人及其意图进行解读的一个尝试，一种亲历移情、体验神入的理解。

这样一种体而验之的解读考察要比（譬如说）福尔摩斯的任务更为深入、更具有渗透力，那只是要发现实际发生了什么，而真相也是一种相对直接的科学事件。这并不是说福尔摩斯寻找真相的任务很简单，恰恰相反，这一任务需要根据巧妙地得自各种各样的、通常是始料未及的原始资料里的实际线索，做出精明的因果推理，然后以之对人类敏感的心理进行大量的整理和复杂而有机的综合，以至福尔摩斯过去理所当然地受人钦佩，而且现在仍然被高度赞誉为天才侦

文本诠释学及其他：

以《道德经》和《庄子》为例

探——哪怕他是个虚构的人物。

然而,如果说连福尔摩斯这种相对直接的发现真相之举都充满了如此艰难的复杂性,那么我们会明白,文本诠释学的任务,即在历史层面上领悟人生,则需要怎样多得多的交互感应的智巧。即使以福尔摩斯式的方法成功破解了笔迹、顺利破译了句子(如同通过罗塞塔石碑的研究来破译埃及的书面文字)以后,仍然有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对原作者、最初的读者以及后来几代读者而言,那些信息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不仅要破译表面的意义对应物,而且要敏锐地确定文本所言的涵义、影响力、情感及深长意味(正如在理解古埃及人生活时之所为)。^①

使得这一历史性领悟加倍困难的是,那个简单的、在事实上层面上视为当然的“客观性”,在此彻底地动摇了。问题不止于我们解读探究的目的微妙而难以捉摸。关于古人的人生领悟需要研究者的共鸣;“主观性”被牵扯到了关于人生领悟的所谓“客观”准确性之中。这需要研究者去躬行狄尔泰所说的重新体验和柯林伍德所说的重新扮演(reenactment)。^②

在此,研究者预先设想的参考框架(无此,研究便不能进行)必须调整得与古代文本之忠实领悟保持一致,即调整得最有助于这种领悟。由于那个预先设想的框架来自我们视为当然的生活知识所及,因此我们必须检查自己的预设,甚至要经常给它们“打上括号”,搁置起来(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悬搁),以便向文本所言、至少是似乎所言的一切绝对开放。

因此,我们朝向文本的调整极其明显地表现在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之中。即使在发现事实的层面,我们也必须就手头现有的线索进行提问,此外,提问方式至关重要地决定着

我们理解任务的成败。康德所谓的“哥白尼革命”不无道理，那是说我们探究自然以体验，以认知，而被信以为真的客观经验知识充斥着我们的主观的认识范畴。

同样，“你何时不再去殴打你妻子”的问题并非可有可无的玩笑。我们问什么和如何提问都处于诠释学的中心；批判地研究“提问”对成功解读至关重要。因此，诠释学也就是怀疑论。

西方的诠释学

在各种提问中，诠释学提问可见到两个种类：它们是西方的客观类型（本文在此交代）和中国的主观类型（下一部分交代）。西方诠释学自《圣经》解读发展而来，通常提问客观性、批评性和反思性的三种问题：“文本说什么？”“文本所言是否确实？”和“如此提问到底有何意谓？”

第一个问题“文本说什么？”被问及，是要排除解读者任何主观的“解释”，其唯一目的应是忠实理解文本真正所说的内容。关于文本真“义”的探寻当然包含针对“真”本的探寻。这两种探寻构成了诠释学循环：在寻找真本前，必须知道文本的真义；而要了解文本真义，又必须阅读真本。

这种诠释学的探索由基督教的热诚而引发，教徒们热寻求早期教会里的正统说法，以确定《圣经》文本“真”义。这种宗教热情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据推测死海中发现的羊皮纸卷轴促成了更标准、更“准确”的《圣经》版本的发行（其实那是翻译，是低调表达的诠释）。它们是新译本，是带着“翻译”的虔诚外观而做的解读，以供普通基督徒祈祷所

用。教外人士寻求正统学说的热情也在继续,这表现在关于伟大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的真正意指和误解几许的无休止的争辩之中;而且表现在怀特海《过程与实在》一书“修正版”的发行和克尔恺郭尔作品的“确定性”翻译,以及伟大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和尼采等著作汇编之“定本”的不断涌现诸事件之上。^③

坦率地说,福尔摩斯科学地寻找真相之举与针对实情所做的人生领悟的“客观”准确性,均是这一“科学”诠释学倾向的标志,而这一倾向最终孕育了目前时髦的西方“诠释学”。

与此适成对照的是,中国诠释学传统达致文本所言之客观准确性的捷径曾经是(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版本校勘和文本分析,它们相对独立于文本之所言,更远离文本思想在其最初交流情境中被表达时之所指。下文即将探讨这一点。

第二个诠释学问题“文本所言是否确实?”需要排除解读者的主观性,但需要进行客观的、批判性的评价。这一问题至少有两个特点,即客观性和批判性。首先,解读者不仅应该是忠实的,而且应该是批判性的,从客观角度对文本所言的优缺点做出公正的判断。

其次,解读者要摒弃个人的好恶,以获得普遍有效的评价。如果一位思想家说他“忠于”这样那样的传统,那么,他通常是指他对传统的建言有所评价,以便阐明何物——那仿佛是传统中的“精华”——具有客观价值。当怀特海讥讽西方哲学是“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解”时,他肯定是在这种批判性诠释学的意义上当真而言。海德格尔论柏拉图、康德和尼采的著述,也受着这同一种批判性诠释学的推动。

对比之下，中国思想家常常将他们批评著作归为“评注”文体。中国的评注传统在尊重大师孔子并提高其地位的过程中兴盛起来。那些评注者有意无意地试图引申孔子真正的精神和意图，为“引出”这位原作者的“真义”而剔除“错误”解释。这种虔诚的评注活动永无止境地进行着，近来流行起来的“新儒学”可以证实这一点。新儒学过去常指宋明时的朱熹、王阳明和陆象山。目前，现代新儒家有八位：四位在中国大陆，另四位在中国台湾。人们认为当代新儒家是：刘述先、杜维明、狄培瑞（Theodore de Bary）、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等人。

西方诠释学中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此提问到底有何意谓？”由于它针对的不是任何直接提供信息的东西，而是这种探索本身，它似乎毫无收获，这确实很奇怪。而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是颇多成果的，收获是双重的。

首先，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毕生所有的理解乃是解读一事。因此诠释学不只涉及古代文本，它还描述了我们的整个人生。诠释学即是做人的意谓。这是现代初期现象学家如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利科、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的惊人发现。^④

其次，诠释学在按照前面两个问题的指向——事情实际如何与它如何具有客观有效性——而追寻时，则被人发现是注定失败的无用工作。这是另一个意外收获，当代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收获。我们现在回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类似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和文化相对论观点，而审慎地改弦易辙，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落入这种简单的相对论的窠臼。^⑤

于是西方的客观型诠释学在历史和文化相对论中似乎到了破产的境地。历史在重复,而以那些重逐早期倾向的后来者知道自己在走老路的事实为条件。他们应该怎么办?也许他们会想看看不同的诠释学传统,比如中国的诠释学传统。

中国的诠释学

在此是第二种诠释学,中国的主观型诠释学。这一传统实际上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主要由三个诠释学问题即政治的、辩护的和虔诚的问题所支配。首先是“这一古代文本如何支持当前政治的意识形态?”然后是“这一文本思想如何对抗其他传统?”再次是“这种文本思想背景如何培育我的人生?”^⑥

第一个问题——“这一古典文本如何支持着当今的朝代?”——由双重的虔诚态度而引发:对正统(尤其是儒家)理想的钦佩,伴之以对现有政治体制的钦佩。由于儒家理想惯常以为具体化在政治之中,因此这两种钦佩态度被叠加为一体。

最初,那些像孟子一样的士大夫们虔诚地指望,统治者会通过现有体制与古代理想的认同而得到告诫,将他们的统治顺应儒家的平民主义,成为一个人道的政府。士大夫们将政治与儒家的经典等同起来,以使政治“儒家化”。但是,这一虔诚的愿望很快就被严厉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曲解为儒家思想的政治化。学者的颂扬这时已使统治权成为在政治上的合法存在。^⑦儒家思想得以体制化,成为一种有力的督促